

健康、醫療、知識份子與社會

● ● ● ● 陳美霞的學術觀 ● ● ● ●

鄭金朋/台灣時報編輯

「我等就來唱山歌」，反美濃水庫的一群客家朋友，最近送給來自屏東客家村的陳美霞教授一張他們自己灌錄的CD，她聽著聽著，淚流不止。

一個聽到故鄉山歌就會流淚的人，該是一棵時刻不能失去原鄉泥土涵養的蘭花吧！當她在異鄉歷經學術洗禮，更堅定的要做「台灣的知識份子」時，卻因政治因素而回不了家。說到意外成為德州奧斯汀僅有的四名「黑名單」之一的往事，陳美霞一貫的雲淡風輕，似笑非笑像是只在轉述別人的故事，讓人抓不到當時的情緒。當我們放心的以為那些都已灰飛煙滅，她說著說著突然冒出一句「台灣，我的地方啊！我要回來」，「來」字尾音不止而成「矣」，終了氣若游絲字字怨氣如血淚控訴，鏤刻心肺痛得又叫人清醒。至此我見識了當年「黑名單」有家歸不得的怨歎。

從芝加哥大學回國為成大醫學院效力的公衛所所長陳美霞教授，以「健康、醫療、知識份子與社會」為題演講，回顧學術生涯。健康、醫療與社會的關係正是她前半生學術生涯的關注焦點，做一個不離人世的知識份子是她對自己的期許；「黑名單」則讓她的生命意外多了一點政治味，像是被錯加了調味料的一道湯，不容易入口，反倒教人回味再三。

陳教授自師大衛生教育系畢業後，就到美國夏威夷大學攻讀公共衛生

碩士，這是她思想啟蒙的時期，她用「大重整」、「大掙扎」來形容到異地後所帶給她的視野變化，她也重新思考自己要做什麼。當時在美國的台灣留學生跨海發起一件援救台灣某政治犯的行動，讓她受到很大的衝擊；她驚覺自己對台灣、中國的現代史所知不多，於是她變成一個飢餓的人，在充實專業之外，還急著要補起這些思想上的空白。她也開始思考「階層/階級」、「剝削」、「社會分析批判」、「帝國主義」、「保衛釣魚台運動」等議題。

到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讀博士學位則是她思想及專業深化的時期。她仍然很堅定的要在學成後回台灣，為弱勢者盡一己之力。她也期許自己若要成為一個具批判性的知識份子，就要對特權(privilege)、權力(power)、和榮耀(honor)三者棄之如鄙屢，猶如知識份子的自我放逐；而身在異國，對所來自的故鄉同時兼具熟悉性與距離造成的客觀性，魂牽夢縈，何曾不像流放者。

就在這時她成了「黑名單」之一員，原因有二。之一是她與林孝信老師結婚，林老師因參與保衛釣魚台運動而被台灣當局列為黑名單，陳教授因此同受池魚之殃。無法如願回國，便到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任教及研究，以進一步充實自己的專業。之二是，在德州大學任教時，她與德大的台

灣同學因交往而相熟，德大台灣同學會請她當教師顧問。她即時常請台灣同學到她家裡吃飯，一方面幫助同學減輕思鄉之苦，另方面也談論、分析台灣時政，她說，「關心國家大事乃知識份子的天職」，卻因此引起奧斯汀當時台灣國民黨政府代表的「關心」。

陳教授認為她在奧斯汀建立了自己的主體性，即「我不要成為美國的知識份子，我是台灣來的，台灣有台灣的問題，和美國並不一樣」；所以她在教學上教的是「國際衛生」。在研究上則從事了許多量性的研究，發表的論文備受肯定。這時她也持續的與留學生團體接觸，分析及批判台灣的問題。

後來又到芝加哥大學，她一頭鑽進了這個學術殿堂，著手進行批判性的健康研究，以及參與世界衛生組織的研究；也開始把研究工作與她「夢寐以求」的台灣結合，從健康與醫療的角度重新檢視台灣經濟奇蹟背後的得失，並進一步把研究觸角擴展到有同樣問題的東南亞和大陸。

1996年她終於如願回到台灣，當時正是中共發動一連串軍事演習，台海局勢動盪的時候，許多人急著往外跑，她卻回來了。回來後她切身感受這片土地，批判筆鋒更見犀利，接連在媒體發表的幾篇文章都引起迴響，如對衛生署偏差政策、醫學資源分配

的區域正義，和醫學/公衛主流的批判，從政府與企業的社會責任角度探討防癌政策，以及對開放代理孕母政策的批判等。

陳教授說，她對知識份子的定義是入世的，是像宋朝范仲淹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」；或是像法國哲學家沙特說的，「必須與奮鬥的難苦群眾同在，成為被壓迫者的一份子，…」；國內學者楊國樞把知識份子分成古典/人文、科技、和組織三類，第一類是對弱勢者的關心，第二類是具專業能力的知識份子，第三類是管理者，他並推崇第一類的知識份子。其他如民初的魯迅、語言學大師瓊斯基等人，對知識份子的界定也都屬於這一類型。陳教授強調，知識份子只有專業是不夠的，因為專業是為了社會，所有知識份子不能離開社會。

陳教授藉這次演講也回顧了自己的學術之路，對自己的抉擇與堅持，她樂觀的說：「道路是曲折的，前途是光明的。」最後一張投影片還不忘問我們：「你願意一起來共同走這條路嗎？」日前中國時報一篇報導林孝信的人物側寫，提到他對科學教育的關心三十年來始終如一，記者最後讚曰：「瞧！林孝信還是林孝信！」這裏我們借用他的句子，也說：「陳美霞就是陳美霞！」

